

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刘海峰

摘要：1905年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关键词：科举；考试；八股文；进士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5)04-0041-06

在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中，有的在创制之初轰轰烈烈，并被人们广为称颂，但时间一久便烟消云散，在历史上很少留下痕迹；有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引人注目，在其存在期间也不断被人批评，但却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在退出历史舞台后还常常为人们所提起。科举制便属于后者。身处科举时代的人对科举观察得虽很细致，但却不一定很全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空距离拉开之后，尤其是与其他参照系进行比较之后，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自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朝政府发表上谕宣布停废科举，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了。科举制的停废，终结了1300年尊崇科举的时代。此后的100年，总体而言，中国进入了一个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在科举制百年祭的今天，回顾1400年间科举评价的沧桑巨变，反思科举制的千秋功罪，我认为，有必要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应该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

一、尊崇科举的时代

科举时代是指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社会高度重视科举、科举具有重要影响的时代。中国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虽然科举在社会上的重要性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属于科举时代。可以这么说，所谓科举时代，也就是实行科举、尊崇科举的时代。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创建了进士科，虽然因国祚短促，进士科的影响还未充分显露，但标志着科举时代的开始。到唐代，科举制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朝廷将裨教化，广设

*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AA030198）。

作者简介：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科场。”自唐太宗以后,进士科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崇重,所以士人趋之若鹜,“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受科举考试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推动,科举考试内容日渐丰富,考试条规趋于繁密,科举在社会上真正占有了重要地位。

从唐中宗神龙(705-707年)以后,还形成了曲江宴会、杏园探花、雁塔题名等科第风尚。当新科进士泛舟于曲江之上宴饮之时,请宫中教坊派乐队演奏助兴,长安城士女百姓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有时皇帝也登临曲江南岸的楼台观看,成为唐代京城的一大景观。这种风尚到唐玄宗时期更是盛行,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科举时代人们对科名的重视程度。唐代进士科竞争相当激烈,一旦及第,就是一件十分荣耀风光的大喜事,有如鲤鱼跃龙门,故云“一登龙门,则身份十倍”。新科进士甚至被形容为头上有“七尺焰光”。晚唐时期,朝野进一步重视进士科。“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

宋代科举在社会上的地位十分崇高,状元登第仪式风光无比,甚至有领兵数十万恢复幽州蓟州、班师凯旋都不可与状元相比的说法。《儒林公议》卷上说:“每殿庭牖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鞞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下瞰者,庶士倾羨,欢动都邑。”士子一旦及第登科,意味着十年寒窗生涯到了终端,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人生发展阶段。与现代社会职业多样化不同,在实行官本位体制的中国古代,科举是读书人出人头地实现人生抱负、施展才华的惟一途径,造成整个社会高度重视科举,出现“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情况。南宋科举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洪迈《容斋随笔》中记载了说当时流传的得意、失意诗两首:“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诗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与应举落第成为人生四大快事与悲事之一,足见科举在宋代社会影响之广泛。

元代科举所取人数虽然不很多,但进士的素质也很高,故《元史·选举志》说“科举取士,得人为盛焉”,元代民间也有“国朝入仕之门,莫尚进士科”的说法。

明代则是一个高度崇重科举的朝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说:“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清时期,科举发展得相当完备,政府对科举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的地步。明太宗时,已将考取进士视为“国家取人才第一要路”。史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④科举考试影响无孔不入,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ez Semedo)所说的:“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大家关切地注意的目标,是大家关怀备至、魂系梦萦的事物。”^⑤

读书应举是科举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仕宦的必由之路,因而科举成为当时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和士人发展的首要步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借人物之口说:“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第十五回中则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中举及第不仅意味着人生际遇的转折,而且可以光耀门楣。有的西方人认为,就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的得胜者也不及在北京殿试及第者来得荣耀。”^⑥彭元瑞在《录遗告子》中说:“科举一道,得失颇重,不特功名之路,抑且颜面所关。”^⑦《二刻拍案惊奇》中载有《女秀才移花接木》的故事,其中谈到社会上重视进士的情况,并说“世间情面,哪有不让缙绅的?”《警世通言》第十八卷和《今古奇观》第二十一卷《老门生三世报恩》中则说:“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科第,谁说他胸中才学?”

科名为社会所崇尚,流风所及,甚至还形成了榜下择婿的习俗。唐代进士放榜之后,“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④由于科举制的兴起,在人们的择偶观念中,郎才女貌比门当户对更重要,而所谓才,主要是指能考中科举的文才。宋代女子择偶,最重进士及第,乃至盛行“榜下捉婿”的风尚。“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试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家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于饵士人,使之俯就。”^⑤这种婚姻重科第的习俗到清代还普遍存在,并有所发展。在有些地区,甚至认为与新秀才接触都会给女子带来好运,据《清稗类钞》载:“科举时代,江苏之常州各属院试,必于江阴,凡赁庠者,一衿既青,门前屋角,必有妇女于暗中牵襟弄裾,名曰摸秀,谓可得佳婿,兆宜男。又或于院试奖赏之日,小家新妇联袂出游,故与新秀才摩肩而过,谓曰轧秀。”^⑥连与新进秀才触碰都能带来福气,说明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美妙。

总之,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影响重大而深远,几乎到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程度。只是物极必反,清代科举也极盛而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东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根基发生动摇,终于在1905年走到穷途末路,结束了1300年的科举时代。

二、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

在1905年废科举前夕,许多进步人士已批判过科举制,特别是激烈地抨击八股文这种科举考试文体,康有为甚至认为清末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可以说,明末以来批判科举制的矛头基本上都是对准八股文的,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邓嗣禹便认为清末废科举之原因,一为八股文之反动,二为外患之刺激。^⑦尽管在1901年以后,八股文已先被废去,但人们对科举制的坏印象已经形成,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型的努力还未实现,科举制便已被彻底废去,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两科的考试内容已和现代文官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基本相同;以致人们一提起科举,就想到八股文,就觉得科举是一个坏东西。

废科举后的100年,大体上可以说是将科举制妖魔化的时代。由于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许多人对科举的认识遵行这样的逻辑:因为科举制很坏,所以才会被废除;因为科举制被废,所以科举制肯定很坏。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委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科举取士利弊兼具,且影响重大而复杂,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然而,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废科举时过激言论的影响,而清末士人批判科举却有以偏概全之嫌。^⑧

受认定科举制很坏的思维定势影响,当人们分析历史上一些问题时,往往不假思索地将罪过归结到科举制头上。为了批判科举制,有时甚至倒果为因。例如,不少人连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也归罪于科举制,但是很少考虑到,1905年以后没有了科举制,官场的险恶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植党营私、派系倾轧的情况还变本加厉,实际上官场腐败是促使科举制加速灭亡

的原因之一。又如,解决不了官本位的痼疾,就说是长期的科举制造成了官本位的传统,也不仔细思考一下,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往科举制中寻找官本位的根源,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洞见事实的本源。

科举制承负了许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罪责。例如,不少人批评科举制不平等,因为它不允许占半数人口的女性报考,似乎妇女无权参政就是科举的错。这实在是冤枉了科举制,妇女无权参政并非科举的罪过,而是传统社会的官僚结构使然。^⑩不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创造性,不是我们的先民故意限制女性报考。无论古代科举制度的创制者或改革者再有创意,也不会将女性包括到考生中来,因为在父权时代或男权时代,各级政府中本身就没有设女性官员,科举怎么会去招考女性呢?古人也不是全然想不到要为女性开辟科举的途径,例如,清代有《女开科传》的小说构想出专门的女性科举,清末小说《续镜花缘》也构想出武则天开女子科举直至发榜的情节。当太平天国政权中设有女性官员时,便有关于类似女子科举的记载。只是一般情况下,传统社会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政府中没有女官,科举自然不会招考女生。其实,很多批判科举的说法都不太全面。在分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科举制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切都是科举的错。长此以往,科举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丑恶的名词。当要说某一种考试或机制不好时,说其“变成了科举”便已足矣,便是很重的批评。许多人对“科举”一词避之惟恐不及,即使有人不再将进士和举人视为贬义词,偶尔比附一下,也多会遭到激烈的抨击。例如,2003年8月,北京西南部门头沟区灵水村举办“举人节”(又称举人“金榜”文化节),试图通过此活动募集资金修缮已经濒临坍塌的大量珍贵古建筑,结果招徕许多媒体的冷嘲热讽。2004年夏,北京安定门街道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合作,准备将1978年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大名刻录成碑,立在北京孔庙中,与198块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比肩而立。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认为这是足可诧异的奇事,认为“不要看科举制度废除了百年,但科举之历史幽魂,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继续缠绕在国人的心头”;“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木乃伊归来了。”^⑪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该计划当然只好作罢。由此事件,可见“科举”一词的杀伤力之一斑。

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然而,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许多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是应该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了。

三、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过去的一个世纪,虽然总体而言可以称之为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但还是不断有一些人称赞过科举制,而且其趋势是离科举越远,对科举制的评价越为正面。此一趋势发展到2005年,量变终将引起质变,中国必将与先前的韩国一样,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韩国历史上模仿中国,实行了九百余年的科举制。科举制的利弊影响在韩国古代社会与中国基本一致,也有许多人批评科举制的弊端。在1894年废止科举之后,虽然不像中国那么激烈,但总的来说也是批判的多,研究的少。到后来,便出现深入研究多,盲目批判的少,肯定的多,否定的少。在看到科举制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科举制的积极作用,并将科举制视为韩国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来对待,因此1994年韩国才会在科举百年之际再现科举盛况。

实际上,“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

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②我们对中国先民历经千年传承实行的科举制,应有一定的尊重。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其作出理性而全面的判断。清末废科举时的批判言论,有不少是高度情绪化的、以偏概全的。后来许多人对科举制的批判也只是人云亦云。例如,关于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的问题,人们往往举出蒲松龄多次乡试未中来说明科举压抑或遗漏人才。其实,许多个案千差万别,个别不能否定一般。1882年,有位西方人便指出:“在科场失意者中,也经常能发现那种颇有文学才能的人,著名的《聊斋》作者即是一个明例。必要之时,他的不幸遭遇总被人们作为那种富有才华而未能在科考竞争中出人头地的榜样,不厌其烦地引用。毫无疑问,也有许多颇具管理才能和其它才能的人也经常被命运作弄,在个人生活的道路上走着一条同样失望的路。但就全局而言,竞争考试的结果还是对社会有利的。”^③

将晚清时中国衰弱归因于科举是一种常见的说法,日本学者原胜郎在20世纪初便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曰中国衰微之根源乃科举也,呜呼!科举果其罪乎?他认为,中国千余年来进行科举考试,历朝逐次加以改良,决非可以嗤笑之物。就通过公开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而言,中国文明可以说远远领先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如果将中国的衰败归结于科举制度,那么没有科举考试的中国或许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就走上穷途末路。关于人们对考八股文不切社会实际的问题,原胜郎指出,考试科目的问题只是细枝末节,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锁国政策。若是中国自主地开放门户,维持公平的人才录用制度,也就是说,中国如果时刻地保持与世界同步,注重人才选拔之公正性的话,那么考试科目这一问题自然也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进。他还说:“科举未必是一概否定的恶制,反而存在了足以大为称颂之处。中国社会的停滞,并不在于“科举”,而是中国文明早在数个世纪之前即已经达到了的顶峰。后来之所以衰败,不过是“其命数穷也。”^④

对科举制评价最高的名人应该是孙中山,他在许多场合发表了大量的称赞科举考试的言论,并认为废止科举不一定正确。他在1918年便说: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⑤这是直接指出废科举是因噎而废食,值得人们深思。当代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的来说已越来越高。如有学者认为,科举取士制度具有“贤能治国、为我所用,竞争公平、标准客观,立法保护、稳定连续”的合理性。科举制的三大历史价值:促使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比较完善的文官治国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完整延传,造就出无数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其它领域中的学问家;对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⑥又有论者说:现在许多人一听到科举便生恶感,其实那时中者大多是聪明人,像“范进中举”一类笑话,毕竟属于科举的“末流”。作为后来人,我们对于科举的得失当有一个理性的认知。^⑦此方面的言论已越来越多,基本上出现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深入研究科举者基本上是对科举肯定较多者。

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都相当显著,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只重复清朝末年批判科举的言论便会遮蔽自己的眼光。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1905年人们对科举的看法很类似于1966年人们对高考的看法。如果现在想了解文革前夕人们对高考的观点,人们从报刊流传下来的记载中,基本上只能找到批判高考弊端的言论。而且,受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宣传影响,很多人也确实觉得高考应该废除——许多高中生在废高考后也真正觉得相当喜悦轻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痛定思痛,人们终于觉悟,其实中国社会还是离不开考试。考试制度就是这么奇怪,当你身处其中时,都感到巨大的竞争压力,巴不得解脱出来。可是当你挣脱考试的锁链以后,往往会发现连同公平竞争的机会一同失去了。当陷入无序的恶性竞争环境之后,你可能变得很怀念过去那么痛恨的考试制度了。梁启超等人对科举看法的转变是这样,文革前后“老三届”中学生对高考的看法也是这样。^⑧

什么是科举?科举就是一种考试选才制度。科举制度非常复杂,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也有诸多变化,它可以是唐代选拔数学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可以是考经学和文学的明经科和进士科,它可以是明清以八股文为主要考试内容的古代考试制度,也可以是1902到1904年间主要考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的近代考试制度……。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科举制的实质,就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

考什么、怎么考是一回事,要不要考试是另一回事。否定科举至多只能否定其不符时代需要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否定高考或主张取消高考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将高考与科举制类比,只要说高考“变成了科举”,或者说高考是“新科举”、“现代科举”,似乎就是很重的批评。其实,科举本身已被妖魔化了,需要拨乱反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千百年中多次对比实践,证明科举考试远比其他选材方法来得公平和有效,科举制才能历久不废。在科举制百年祭的当口,我们有理由而且也有必要提出: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此其时也。

注释:

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中。

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全唐文》卷348李白《与韩荆州书》。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

《唐会要》卷76《进士》。

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

《元史》卷81《选举志》。

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3《送曹汝嘉漕掾秩满序》。

《明史》卷70《选举志》。

《明太宗实录》卷28。

⑪《明史》卷69《选举志》。

⑫曾德昭1667年在里昂出版的法文著作《分成三个部分的中国通史》第8章,第61页。转引自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ed.,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N. Y.: ME Shap, Inc., 1987, p. 24.

⑬ Paul F. Cressey, *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Examination System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2, No. 2, September, 1929, pp. 250 - 262.

⑭彭元瑞:《明斋小识》卷7《录遗告子》。

⑮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

⑯朱彖:《漳州可谈》卷1。

⑰徐珂:《清稗类钞》迷信类“摸秀轧秀之得婿宜男”条。

⑱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版,第268页。

⑲刘海峰:《知今通古论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

⑳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㉑许纪霖:《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

㉒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6期。

㉓ H. A. Giles, *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London, 1882, p. 255 ~ 256.

㉔宫崎市定:《科举史》,东京:平凡社,1987年版,第317 - 321页。

㉕《宪法为立国之基础——宴请国会及省议会时的演说》(1918年2月7日),《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529页。

㉖杨朝仁:《科举取仕的历史嬗变与现实观照》,《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

㉗遭人:《书屋絮语》,《书屋》2005年1期。

㉘刘海峰:《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湖北招生考试》2005年4月号下半月。